

从女性解放角度重论冯沅君创作思想的转变及其意义*

兰宏君,高晓瑞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成都 610011)

摘要:冯沅君是五四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女作家之一,同时代批评家肯定她的前期创作反映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冲破一切的时代精神,又真实地写出新青年在新旧思想之间的徘徊,对其后期小说创作削弱了反封建礼教精神感到非常惋惜。冯沅君后期创作思想发生变化是因为她对五四女性解放现实状况的认识更加深刻,对女性解放的思考更加深入。对女性解放而言,冯沅君后期创作虽表面消沉,但实际蕴含一种发展,同样具有独特意义与价值。

关键词:冯沅君;女性解放;创作思想;《春痕》;《劫灰》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465(2024)02-0023-05

当代冯沅君小说研究成果十分丰富,特别是对其主题思想的研究成果颇多。如孟悦、戴锦华从反抗方式、性爱道德观与母女纽带三个角度解读冯沅君作为五四新女性的勇敢与怯懦^{[1]83-91};刘思谦论述了冯沅君小说中的反抗同盟“我们”,以及“情人之爱与母女之爱的两全之策”^{[2]36};乔以钢从分析小说中的恋爱心理入手论述冯沅君在试图建立现代爱情理念时表现出的无畏又怯懦^[3];李玲关注的是冯沅君直面封建父权夫权时无畏而又退让的思想特质^[4];庄莹分析了《卷施》在价值体系与叙事模式两方面的裂痕^[5];李倩以冯沅君为例分析了新一代知识女性在反传统过程中徘徊、犹疑的心境^[6]。

当代学者多认为冯沅君小说表现出的五四青年勇毅反抗封建传统时的坚决又徘徊心理极具特色,并且小说集《卷施》的意义较《劫灰》(小说集)与《春痕》(书信体小说)更为突出。长期处于研究中心的《卷施》的确意义独特,但《劫灰》《春痕》是否确实没有超越《卷施》的方面?本文首先追溯更早的冯沅君小说创作批评,找到《卷施》被确立为冯沅君代表作的历史渊源;然后从女性解放角度,以《劫灰》《春痕》为中心,在文本分析基础上,阐释《劫灰》《春痕》体现的冯沅君创作思想转变之处;最后评价这一转变的价值与意义。

一、从反抗到消沉:从人的解放角度评价转变

五四时期,个性解放思想成为时代精神,五四启蒙小说走向鼎盛^[7]。冯沅君作为受五四思潮熏染的新女性,积极开展小说创作。鲁迅称赞她的小说

是五四青年心态的真实写照;阿英赞扬她在封建思想仍然具有极强影响力的时代勇敢地描写女性的恋爱情心理;毅真评价她的作品在反抗封建传统的意义上当为新女性作家的先锋。在肯定冯沅君小说作品的同时,批评家们也指出了冯沅君创作的不足。鲁迅曾委婉地指出冯沅君婚后再也没有《旅行》与《隔绝》那样的作品问世;阿英在总结冯沅君的小说创作时认为《卷施》是冯沅君的代表作,原因是其中蕴含了《劫灰》《春痕》缺乏的“生命活力”^{[8]338}。显然,同时代批评家更认可《卷施》,原因是这部小说集具备的勇敢反叛精神响应了五四思想启蒙,刻画了受新思潮影响的青年们决然地争取个人解放的社会现象,渗透在《卷施》中的迷茫心理又真实地反映了中国文化转型期间新旧思想的矛盾。《劫灰》与《春痕》则因为明显的消沉色调而对思想解放运动不具备意义。总体而言,当时的批评家认为冯沅君在《劫灰》《春痕》中所体现出的创作思想的转变是倒退,对此,今人应结合时代背景去理解与认识。

五四新文化运动健将周作人曾指出:“人的问题,从来未经解决,女人小儿更不必说了,如今第一步先从人说起。”^{[9]576}《人的文学》一文在理论批评上正式打出人的解放旗帜,“人的文学”也被视为五四文学的理论纲领。五四思潮是关于人的解放的“社会—哲学思潮”^{[10]321}。五四新文化运动强调“整体的人”,强调要“塑造‘不屈’的民族灵魂”^{[11]32}。冯沅君前期的创作契合了这两点,小说人物均以“我们”为同盟决然地反抗封建礼教。在晚清时期

收稿日期:2023-06-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师承关系与五四文学活动研究”(22FZW079)

作者简介:兰宏君(2000—),女,四川德阳人,硕士研究生,专业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的妇女解放潮流中,女性具有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并积极投身国家改良^[12]。直至五四时期,对封建礼教的批判、对个体自由的呼唤构成了女性解放议题转向的主要因素。当五四启蒙者在论证自由权利不可剥夺并抨击封建传统时,他们势必将受“夫为妻纲”压迫千年的女性包括在内。对女性个体而言,在伴随人的觉醒而发生的女性解放浪潮中,人的解放是主流话语,女性解放作为其中一部分的目的是促进人的解放。冯沅君作为五四时期的代表作家,鲁迅等批评家对其创作的评价着重点是人的解放。但从女性解放角度分析冯沅君创作思想的转变,其中仍然有为女性解放所做的努力。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与阿英均没有明确指出冯沅君创作思想转变发生在何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与影响最大的年代正是中国思想史上的“转型时代”(1895—1925)^[13],李何林也曾指出“五卅”推动了中国文学思潮的转向^[14]。同时,1925年冯沅君脱离了学生身份,步入了教师行业。这一年冯沅君的战斗精神发生了巨大转变,《误点》《写于母亲走后》中的反封建礼教意识式微。故本文将冯沅君的小说创作以1925年为节点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将《劫灰》《春痕》和《卷菴》中的《误点》《写于母亲走后》均归入冯沅君的后期创作。

二、从反抗到反思:从女性解放角度分析转变

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的矛头之一是封建礼教,如陈独秀1916年发表《宪法与孔教》,对礼教发起强攻^[15]。先驱们唤醒了以冯沅君为代表的青年女性,她们积极承继男性大师们的创作立场,坚持以批判、反抗封建礼教为中心。反抗方式之一是抗拒包办婚姻、追求自由恋爱,如冯沅君在前期小说《隔绝》中写到:“我们开了为要求恋爱自由而死的血路。我们应将此路的情形指示给青年们。”^[16]¹¹ 20世纪20年代中期,陈独秀转向、胡适淡出、周作人隐退,五四启蒙浪潮逐渐走向落寞。面对社会思潮的急速转向,鲁迅发出“成了游勇,布不成阵”^[17]⁴⁵⁶的慨叹。他对冯沅君创作思想转变的惋惜,也是对五四启蒙文坛冷寂的惋惜。事实上,冯沅君的创作表面上是削弱了反封建精神,但她不是放弃女性解放而是沉着地反思前期的激烈反抗存在的问题。她的反思就体现在1925年及之后塑造的不同于前期的女性形象以及女性的处境、行为与选择中。

(一)对自由恋爱的反思

“在他们看来,爱情本身就是一种理想、一种信仰、一种值得自己用生命去完成的使命。”^[2]³⁰ 刘思

谦详细地阐述过冯沅君前期建构“爱情解放”之路的过程,却没有指出冯沅君后期小说对这条路的解构。首先是已经走出旧家庭建立新家庭的新女性再次深陷泥潭。《晚饭》以儿童视角叙事,文中的妈妈作为知识女性在自由恋爱的婚姻中依然成为男性附庸,因为担心丈夫变心而精神焦虑。《我已在爱神前犯罪了》中的碧琰和丈夫经自由恋爱而成婚,但当丈夫又遇真爱时,碧琰虽内心痛苦却只能秉持恋爱自由的理念祝福丈夫。在冯沅君后期小说中,自由恋爱支撑着新女性走出了旧式家庭,但也正因为崇尚恋爱自由,她们在丈夫变心之后往往只能选择离开,而离开之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18]¹⁶⁶。其次是正在追求自由恋爱的新女性,她们无一例外地陷入因男性泛爱心理造成的折磨与不安中。如:《林先生的信》中的林先生既和文涟恋爱又给馨如留下幻想,同时使两个女人陷入折磨中;《未雨绸缪——呈S》中的婧妹即将与男友分别,一想到男友有可能“朝三暮四”就泪流不止。

从五四运动到20世纪20年代末,与胡适《终身大事》、冰心《秋风秋雨愁煞人》类似的批判包办婚姻的作品不少,如倪貽德1924年的《花影》、陈翔鹤1926年的《西风吹到了枕边》等。1925年前后,冯沅君已经通过写新式家庭中的焦虑女性解构早期“自由恋爱”的反抗道路,通过写正在追求自由恋爱的不安女性解构早期建构的同盟关系,以双重解构对女性反抗包办婚姻之后又如何进行了反思。刘中树认为鲁迅1925年的《伤逝》较同期其他文学作品更值得关注,“因为在《伤逝》中,鲁迅已经在进一步思考‘娜拉走后怎样’”^[11]⁵²。冯沅君对当时新型婚姻的反思与鲁迅的思考时间相近,因为《我已在爱神前犯罪了》就刊登在《莽原》1925年第16期上。

(二)对女性个性解放的反思

冯沅君前期小说的女主人公“生平所受的刺激,仅有恋爱的刺激”^[8]³⁴⁰。前期各个女主人公面临的问题皆是包办婚姻与自由恋爱之间的冲突,后期小说则关注到了新文化运动未能触及到的乡村传统女性。《贞妇》中的慕凤宸在城市找到真爱之后,就毫不犹豫地休掉了包办婚姻的妻子何氏,但何氏却依然坚持为慕家守贞,周围人对此也十分赞许。《劫灰》描写在外求学的新女性回到家乡的所见所闻——被土匪掠夺之后的小寨如同地狱,贞节牌坊却在这场劫难中保存完好。在五四女性解放的浪潮之下,一旦因包办婚姻组建家庭的丈夫又通过自由恋爱找到了真爱,他们的妻子大多将面临被抛弃的

命运。她们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却也成为新思想的受害者。这些女性的遭遇较前期创作中的新女性更深刻地反映了在旧道德被猛烈抨击、新道德体系尚未完全建立之时传统女性的悲剧命运。

五四时期,反封建运动在城市如火如荼地进行,“自由平等”思想深入城市知识青年的内心,而在封建礼教势力最为强大的乡村,多数女性依然处于集体无意识状态中,无法接受新教育、接触新思想。她们是这场运动中的弃儿,思想解放将她们遗忘,恋爱自由则将她们推向更深的深渊。冯沅君由刻画新女性转变到关注未被启蒙女性的命运,她显然已经意识到女性解放不能寄希望于解放部分女性的思想。她通过小说创作指出五四女性解放存在一定局限,女性解放之路任重道远。

(三)对知识女性的反思

“海内外学术界对于五四所开启的现代启蒙运动的结果,有一个共同判断:启蒙运动没有完成。”^[13]回归历史现场,五四时期的启蒙者其实已经预感到“太难改变了”^{[18]171},以致启蒙难以完成,被启蒙者深陷痛苦。以《春痕》为例。《春痕》是书信体小说,由五十封书信组成,被视为冯沅君与陆侃如恋爱时情感状态的真实写照。小说中五十封信的书写始于1926年秋季,结于次年的5月,与冯沅君和陆侃如相识相恋的时间大致吻合,故而以《春痕》分析冯沅君此时的心理状态比较合理。《春痕》多次提及女主人公愁苦的心理,愁苦的原因则是社会大势力的不可抗御:

我相信人之一生有三种阶段:第一是不知人生有痛苦。第二是感到痛苦而反抗痛苦。第三是屈服于社会大势之下,而不能反抗,不敢痛苦,生命之流渐渐干了。^{[16]130}

传统女性不会察觉人生因封建礼教而存在痛苦,《卷施》中的新女性们正在反抗痛苦,而冯沅君自我的写照则是为感受到社会势力无法抵抗而苦闷抑郁的知识女性代言。

《春痕》中提到的“大势力”在冯沅君小说创作最后阶段的《潜悼》(1928年)中被集中揭露出来。在由父权决定的包办婚姻中,文小姐的丈夫常年在外丝毫不关心她的境遇,文小姐不断消磨自己积郁成疾,却始终恪守以夫为纲的观念。文小姐的公婆平时冷漠麻木,在她病倒之后,竟然将希望寄托于鬼神,“国民性”跃然纸上。之后,封建家族得知文小姐重病无医将她抛弃,并计划再娶新妇以延绵子嗣。文小姐盛年亡故,是族权、父权与夫权一同将她拖入

了地狱。小说以男性叙事视角展开,“我”作为新青年仍然对女性抱有封建观念,且在有恋人的情况下对文小姐暗生情愫。从冯沅君刻意采取男性视角的创作中可以发现,她在有意识地解构前期小说建构的“我们”观念,即不再将男性与女性视为共同体。《卷施》中一同反抗礼教的男性不再作为女性的同盟存在,同样被封建礼教剥夺自由恋爱权利的男青年在《潜悼》中将女性视为他者。“在男人的眼中,女人时时处处都是作为一个抽象的他者出现的。”^{[19]226}冯沅君以自己的小说警示当时极度渴望踏入新天地的众多女青年:女性解放要同时反抗封建族权、父权与夫权,这样的困境在当时是“跳不出的樊笼,摔不碎的枷锁”^{[16]111}。

三、从反思到发展:从女性解放角度评价转变

(一)女性解放观的女性视角

小说集《卷施》中的新青年以“我们”为同盟勇敢地争取个人解放;小说集《劫灰》中的传统女性与新女性都生活在封建男权的阴影下;《春痕》中的知识女性则痛苦压抑。《劫灰》中的各篇小说体现着冯沅君对五四女性解放的反思;渗透在《春痕》字里行间的苦闷则表明她在反思过程中觉悟到女性解放仅仅依靠呐喊无法实现,她自己也因为对五四女性解放理想感到幻灭而承受痛苦。早期的冯沅君对五四女性解放尚有期盼,反思之后的冯沅君则不再寄希望于爱情、外部帮扶和理想化的反抗模式。后期小说中表面反封建色彩的削弱体现了她意志的消沉,文本深处则体现出她对五四女性解放认识的不断深化。她通过后期创作揭露女性作为个体的艰难;在五四建构的女性解放道路下,新女性走出旧家庭之后,新家庭又为她们铸造了牢笼;不在这场解放浪潮范围内的传统女性则陷入更悲凉的境遇。冯沅君一步步认识到五四开辟的女性解放之路如此狭窄,她早期奉为真理的反抗道路无法完全解放女性。女性解放是人的解放的一部分,但是这场人的解放浪潮并没有使女性真正地摆脱困境。

人的觉醒是自身不断寻找自我、认识自我的过程,女性意识觉醒则是女性作为个体不断找寻自我的过程。五四话语建构的启蒙道路唤醒了作为“女儿”的女性,却没有告诉作为“女人”的女性如何往前走。以冯沅君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代女作家们最终自觉认识到:女性解放仅仅通过追求婚恋自由和外部力量的帮助无法完成,女性不能一味执着此路。她们历经艰难之后形成的这一认知,是对女性解放极大的推动。即使反思结果十分残酷,她

们的努力也具有价值。丁玲是五四以后第二代女作家们的代表,她的创作与五四时期的大师们所坚持的反封建传统并不吻合。丁玲小说中的女性面临的是毫无退路之后如何走下去的问题,而不是简单的封建家庭与个人间的抉择,她笔下的女性要孤立无援地与现实社会直接对战。

(二)女性解放道路中的女性实践

1. 反抗:女性解放的高潮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第一次女性主义浪潮发生的主战场。在这场运动中,女性在争取教育权等方面取得了较大成果,妇女解放的呼声越发高昂。启蒙运动的先驱们对此十分支持,并以切实行动推动中国女性解放的步伐。《新青年》作为启蒙运动的重要阵地,自1916年第2卷第6号起设置“女子问题”专栏^[20]。陈独秀、鲁迅及吴虞等人先后撰文,抨击“三从四德”“从一而终”等封建旧道德。1917年,吴虞以妻子的名义发表《女权平议》,以欧洲启蒙思想家提倡女权以及美国女性享有的法律权、行政权等为例,倡导国人进行女权革命^[21]。作为近代以来妇女解放的一个高潮,这场运动使越来越多的妇女觉醒,此时的冯沅君对五四女性解放充满希望。1920年4月,冯沅君以原名冯淑兰发表文章《今后吾国女子的道德问题》,呼吁各界关注“尚在苦海沉沦”的女界^[22]³⁹。她在文中批判旧社会妇女恪守的“三从四德”,提出自己理想中女性应该具有的品德——独立、博爱与自强。1923年,冯沅君开始了文学创作。1924年春,她接连发表《隔绝》《隔绝之后》《旅行》《慈母》等四篇小说,它们后来均收录在《卷施》中。

2. 反思:女性解放出现问题

虽然取得的成果足以载入史册,但这场轰轰烈烈的女性解放运动从最初就先天不足。五四女性解放没有以女性自觉醒悟为前提发生,最初的新女性缺乏自我思考,她们“在争取解放道路上的每一进步都最终被承认、被规定”^[1]²³。庐隐曾感叹:“本来男子们可以不讲贞操的,同时也可以狡兔三穴式的讲恋爱。这是社会上予他们的特权,他们乐得东食西宿。”^[23]⁹⁸倡导自由恋爱的目的是解放被封建礼教束缚的青年,在实践中却成为部分男性诓骗女性的新方式。五四女性解放出现的问题促使当时的一些新女性进行反思,如石评梅1925年的《弃妇》、庐隐1927年的《蓝田的忏悔录》。冯沅君也由写恋爱的外部阻碍转向男女内部矛盾,并通过剖析男性泛爱心理警示当时的新女性。1924年凌淑华发表小说

《女儿身世太凄凉》,借小说人物遭遇哀叹女性命运^[24]。尽管凌淑华以女主人公的消亡来反思女性作为个体在追求个性解放中的凄然命运时,冯沅君还在发表小说响应恋爱自由,但正如前文所述,冯沅君对女性通过爱情建立新家庭后又会如何的反思十分超前。

3. 苦闷:女性启蒙内涵的匮乏

五四时代的困惑不仅有启蒙之后又如何、除旧之后如何立新,还有启蒙的含义到底是什么。“五四知识人本身就困扰于这一问题,张灏先生早就指出五四思想的两歧性。”^[13]五四启蒙内涵的匮乏在女性解放方面体现得更为深刻。尹旦萍在探讨五四女性解放历程的文章中,将五四规划的女性解放步骤分为社会解放、个性解放与阶级解放,且“女性的阶级解放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而得以完成”^[25]。冯沅君由反抗、反思到苦闷的心境变化鲜明地传递了一个历史信息,即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无法完成女性的阶级解放,还因为封建礼教与男权的顽固,女性的社会解放和个性解放面临的挑战也十分艰巨。这是五四女性解放无法突破的瓶颈。五四启蒙在如何突破女性解放的瓶颈、如何直面社会环境的缺失上缺乏思考,即使出现过反思也未能引起大范围的警觉。鲁迅曾在《娜拉走后怎样》中告诫新女性在出走后要面临的现实问题,即女性在当时缺失经济权。有学者认为《娜拉走后怎样》提出的问题并没有得到重视,故鲁迅又在1925年创作了《伤逝》。已经注意到女性遭遇的作家们通过文学作品展现五四女性解放过程中的真实问题,试图引起社会警觉。但五四女性解放是未完成的谋划,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反映出五四时期的启蒙者在构想之初对一些现实情况缺乏考虑,五四女性解放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巨大差距。

4. 沉默:女性解放边缘化

苦闷之余,冯沅君面临的是新文化领域内的风云变幻:20世纪20年代末,左翼文学思潮等新思潮崛起,女性主义思潮逐渐边缘化。新文化领域变化的重要原因是民族生存危机的加重,五四思想解放运动难以完成的原因更为复杂。从先驱们的实践过程分析,胡适倡导通过文化更新实现国家转型,陈独秀认为只有通过政治运动才能真正实现建立现代国家的目标。五四新文化运动看似力图将思想解放与政治问题一起解决,实际上二者是分裂的^[13]。并且,文化、思想方面的革新实践执着于引入西方文化。五四启蒙运动缺少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新思

想“几乎与一切既有的概念、观念、范畴或体系失去了内在联系与对应性”^[26]⁶⁷。今人的反思对当时的女性已无用了,有国才有家才有个人,民族危机冲淡了个性解放也淹没了女性解放,女性个体解放议题延后也只能延后。茅盾1929年创作的《虹》鼓励女性投身革命,“克制自己浓郁的女性和更浓郁的母性”^[27]⁶;夏衍1936年创作了《自由魂》,他以讲述秋瑾的故事鼓励女性以革命者的形象融入民族救亡的伟大事业中^[28]。

1928年发表《潜悼》之后,冯沅君不再创作小说。刘思谦认为冯沅君终止小说创作有深层原因,但冯沅君却把答案埋葬在“永久的沉默”中^[2]³⁹。笔者认为就女性解放而言,冯沅君的沉默就是答案。冯沅君前期的创作尚且有女性解放理想作为支撑,后期的苦闷心理本身就体现出理想已经幻灭,加之整个女性解放思潮的衰退,她选择了沉默。冯沅君曾醒悟过、抗争过、反思过,每一步都带着痛苦。新旧思想之间艰难抉择、反思与沉默之间辗转挣扎,走得这样艰难又这样顽强却最终走向沉寂。没有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如何能实现女性解放?正如尹旦萍所述,20世纪中叶新生的祖国以政权的力量实现男女同工同酬,将“男女平等”写进宪法等成就都随着阶级解放、民族解放得以实现^[25]。女性解放不仅需要女性意识的觉醒,还需要整个民族的解放,稳定的政治、经济等予以支持,五四女性解放的现实条件并不充分。

四、结语

走出解放的第一步后,因新旧思想冲突而陷入困境的五四一代的女作家们没有甘于迷茫徘徊。她们有过反思与挣扎,反思挣扎过后的沉默才更为深刻地体现出她们在女性解放之初所面临的艰难处境。她们对自己的处境有深刻的认识并试图冲破困境,却因为女性解放的艰难复杂性无法走得更远。女性在五四思想解放运动中处于比男性更为复杂的局面里——封建礼教顽强、女性解放先天不足、面临更为重要的民族救亡任务等。即使不知“何处是归程”,她们也以自己的努力为后人更深入地推动女性解放开辟了道路。从女性解放角度看,冯沅君小说创作思想的转变是对五四女性解放的一种推动,为后世探究五四女性解放的真实情况提供了珍贵资料。

[参考文献]

- [1] 孟悦,戴锦华. 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 [2] 刘思谦.“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的心路历程[M].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7.
- [3] 乔以钢. 醒世骇俗的性爱篇章:略论冯沅君的小说创作[J]. 南开学报,1995(2):23-26.
- [4] 李玲. 直面封建父权、夫权时的勇敢与怯惧:冯沅君小说论[J]. 江苏社会科学,2000(6):172-177.
- [5] 庄莹.“五四模式”与文本裂痕:以冯沅君作品集《卷施》为中心[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106-111.
- [6] 李倩.“五四”背景下女性书写的兴奋与迷茫:以冯沅君的《卷施》为例[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124-126.
- [7] 杨春时.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274.
- [8] 阿英. 阿英全集:第2卷[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 [9] 周作人. 人的文学[J]. 新青年,1918,5(6):576.
- [10] 刘增杰,关爱和. 中国近现代文学思潮史(上卷)[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321.
- [11] 刘中树,许祖华.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 [12] 吕碧城. 兴女学议[J]. 直隶教育杂志,1906(8):6-11.
- [13] 许小青. 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困境:五四运动百年反思[J]. 近代史学刊,2020(1):35-40.
- [14] 李何林. 近二十年来中国文艺思潮论(1917—1937)[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6:3-7.
- [15] 陈独秀. 宪法与孔教[J]. 新青年,1916,2(3):8-12.
- [16] 冯沅君. 冯沅君小说·春痕[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17] 鲁迅. 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M]//鲁迅全集:第4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56.
- [18] 鲁迅. 娜拉走后怎样[M]//鲁迅全集:第1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19] 波伏娃. 第二性[M]. 陶铁柱,译.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266.
- [20] 女子问题专栏[J]. 新青年,1916,2(6).
- [21] 吴曾兰. 女权平议[J]. 新青年,1917,3(4):90-94.
- [22] 冯淑兰. 今后吾国女子的道德问题[J].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文艺会刊,1920(2):39.
- [23] 庐隐. 蓝田的忏悔录[J]. 小说月报,1927,18(1):98.
- [24] 瑞唐. 女儿身世太凄凉[J]. 晨报副刊,1924-01-13.
- [25] 尹旦萍. 女性解放是什么:五四时期对女性解放涵义的探讨[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118-124.
- [26] 张光芒. 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学思潮论[M].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67.
- [27] 茅盾. 茅盾全集:第2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6.
- [28] 夏衍. 自由魂[J]. 光明,1936,2(2):941-955.

[执行编辑:邓婕]